

是历史唯物主义， 还是历史唯心主义？

——评《水浒》研究中的“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

李 轩

长期以来，对于《水浒》的评论，存在着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存在着历史唯心主义的错误倾向。其中一个论点，就是投降是农民起义的必然结局，并把这种论点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究竟是历史唯物主义，还是历史唯心主义？必须彻底澄清。

（一）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妥协是农民的局限性，并说“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又动摇，以至于妥协投降”是农民起义的逻辑，把《水浒》所描写的宋江受招安，说成是农民起义具有妥协性的必然结局，是什么“历史的真实”，“艺术的真实”。谁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就认为“是没有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农民起义军的成败。”到底什么是农民的局限性？什么是农民革命的逻辑？决不可听凭唯心主义者信口开河，而应当用历史唯物主义加以认真分析。

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是我们研究历史现象，评价历史人物，评论文艺作品的唯一科学的武器。离开了阶级斗争的观点，就完全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可避免地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

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两大对抗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遭受地主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过着极端贫穷和困苦的生活。农民的阶级地位决定了它对地主阶级具有坚决反抗的革命精神，因为只有反抗、斗争、革命，才是唯一的出路。正如毛主席指出：“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曾经发生过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产生了很多起义英雄和农民领袖，表现了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水浒》中的李逵、三阮等“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的英雄气概，抗击官军围剿的无畏精神，对招安进行的不妥协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代表了农民阶级的革命本质。宋江根本就不是农民，只是被地主阶级内部的另一派咬伤了的乏走狗，“权借水泊”，走一条“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的道路。招安和征剿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革命的两重反革命手段。宋江既把梁山起义军拉入受招安的道路，又血腥镇压了方腊农民起义，做了高俅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这说明宋江是农民阶级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的投降只能从地主阶级身上去找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怎么能把他的投降说成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妥协性呢？

由于革命是农民阶级唯一的出路，所以，历史上不少农民起义的火焰一经点燃，很快就成为燎原之势。黄巢起义军克洛阳，破潼关，直捣唐王朝的巢穴长安。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席卷全国，所到之处，穷苦农民欢喜若狂，“迎闯王，不纳粮”，这表现了农民的心愿。太平天国起义军攻占了大半个中国，坚持斗争达十三年之久。《水浒》中梁山起义军也曾在晁盖的领导下迅速扩展，军威雄壮，声震四方。历史上农民革命接连不断，并不因为失败而停止，相反一次比一次规模大。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投降是农民局限性的观点是毫无根据的吗？

毛主席说：“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农民革命，不正是这样向前发展的吗？当然，在当时，由于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农民阶级不能用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代替封建制度，不可能求得彻底的解放，所以，农民的革命斗争，总是不免陷于失败，这是农民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但是，斗争不屈而失败和叛变投降决不是一回事，投降绝不是农民的历史局限性。农民的历史局限性也决不会妨碍农民起义遵循人民革命的逻辑前进。中国封建社会中农民起义虽然屡遭失败，但却一直前赴后继地发生和发展，每次起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正是这大小数百次农民起义，最后把封建社会推向总崩溃，终于在出现了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获得了彻底解放，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来人民革命的历史。

在农民起义队伍中，确也有叛徒投降了敌人，但这只是个别现象，并不代表农民革命的总的趋势，这只能说明阶级斗争的曲折性、复杂性，怎么能把这种现象说成是整个农民阶级的妥协性呢？怎么能因此否定农民阶级的革命性呢？把妥协性强加于农民阶级，并臆造出一条所谓“动摇，反抗，再动摇，再反抗……又动摇，以至妥协投降”的逻辑，强加在起义农民头上，这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历史的颠倒，不是“艺术的真实”，而是艺术的臆造。这种为了颂扬《水浒》而歪曲历史，为了替投降派宋江辩护而诬蔑农民革命斗争的做法，那里有一点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子呢？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

(二)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由于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的分散性和闭塞性使他们只能看到个别地主的剥削压迫，不能看到整个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更不能看到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所以，农民起义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投降皇帝。这种观点也是错误的。

在封建社会里，皇帝是地主阶级的总后台。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国家，强迫农民缴纳贡税和从事无偿的劳役，养活一大群官吏和反动军队。农民所受的压迫和剥削，是以皇帝为首的地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农民分散的小生产状况，限制了他们的眼界，他们只能在斗争中逐步认识到压在他们头上的是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他们的反抗，开始往往是分散的、局部的。但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即使是分散的，局部的，也总是动员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进行镇压。这就促使农民阶级的觉醒，使他们在斗争中逐步联合起来，反对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任何革命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斗争的规模只能说明革命的深度和广度，认识的程度，只能说明革命自觉性的高低。用农民的小生产地位来否认农民能在斗争中逐步认识整个地主阶级的压迫，否认农民起义是反对以皇帝为代表的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这显然是错误的。

农民革命，既然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就同一切阶级斗争一样，总是和国家政权联系在

一起的。在封建社会中，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以农民革命必然是反对皇帝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中国农民革命斗争的历史表明，每次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都把矛头直接对准以皇帝为代表的封建王朝。陈胜、吴广起义时，提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把斗争矛头直指秦二世；黄巾起义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以反抗汉灵帝的统治；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冲的是唐朝最高统治者的“天”；李自成自称“闯王”，闯进了崇祯的金銮殿，吓得他上吊自杀；洪秀全自称“天王”，建立了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与清王朝南北对峙。这些铁的事实，难道不足以说明，农民革命都是把斗争矛头对准封建皇帝的吗？就拿《水浒》中被宋江镇压的方腊、田虎、王庆三支起义军来说，当时都在各地称王，与反动的北宋王朝分庭抗礼。梁山起义军中，以李逵、三阮为代表的一些头领，也是坚决反对宋朝皇帝的。说农民起义不反皇帝，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其实，“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根本不是农民提出来的，而是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持他们摇摇欲坠的统治，用来欺骗农民，转移农民斗争大方向的一个口号。事实上，地主阶级的官僚无官不贪，他们都是封建皇帝的支柱，也是整个反动的封建制度的必然产物。不反皇帝，就不可能真正反“贪官”。宋江和高俅曾经是“死对头”，可是，当梁山起义军三败高俅，把这个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俘获上山后，宋江不但拼命阻止起义军正义的复仇，并且对高俅卑躬屈膝，摇尾乞怜，他所以要讨好高俅，就是因为高俅是宋徽宗的宠臣，他怕因得罪高俅而触怒宋徽宗，可见，宋江倒是把贪官和皇帝联系在一起的。这证明了所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彻头彻尾的骗局。用农民的小生产状况掩盖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把农民的斗争说成是反对个别地主和个别官吏的斗争，这就否定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根本对立，这难道不是站在阶级斗争观点反面的历史唯心主义吗？

(三)

“农民起义必然投降”论认为，农民不可能摆脱地主阶级“忠君”思想的支配，也没有自己的革命思想，所以梁山起义军受招安是必然结局。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一）、农民能不能在斗争中摆脱忠君思想的支配？（二）、农民有没有自己的革命思想？有人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由此作出结论说，忠君思想在封建社会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农民不可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支配。马克思的论断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用来证明农民阶级不能摆脱地主阶级“忠君”思想的支配，农民阶级不可能有自己的革命思想，显然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结论作了孤立的片面的理解。第一、马克思是针对历史唯心主义讲的。历史唯心主义者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分割开来，把思想独立化，似乎历史的发展是由思想的发展推动的。马克思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的胡说，论证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是社会的物质关系决定社会的思想关系，而不是相反。这是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第二、社会的存在，最基本的就是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所以马克思接着就指出：“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马克思在这里讲的虽然是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产生问题，但是有革命的阶级就必然产生革命的思想，则是一个普遍真理。正如列宁指出的：“剥削的存在，永远会在被剥削者本身和个别‘知识分子’代表中间产生一些与这一制度相反的理想。”在中外农民战争史上，产生过无数英雄人

物，产生过许多反封建制度的革命理想。德国农民战争产生过要求“社会平等”和“财产平等”的革命理想，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产生过平分土地的革命理想，中国的农民战争，很早就提出了反对“王权神授”和“均贫富，等贵贱”的思想，到太平天国时期，明确地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的革命纲领。这些农民革命的思想，尽管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受着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带有一定的空想性质，但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容，就是以平等的要求对抗封建的等级制度，以平均主义对抗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度，这显然是同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相对立的。

列宁教导我们，要透过农民革命理想的空想外壳，“细心辨别农民群众真诚的、坚决的、战斗的民主主义的健全而宝贵的内核。”这种“健全而宝贵的内核”正是农民革命的精神武器，那种认为农民不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支配，否认农民有革命思想，实质上就是否认农民起义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当然，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无疑是要影响农民，腐蚀农民的，至今我们还要批判孔孟之道，肃清这些流毒。但是不承认农民有自己的革命思想，并能够在斗争中摆脱地主阶级“忠君”思想的支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试问：“杀去东京，夺了鸟位。”不是农民革命的口号吗？李逵如果同地主阶级的“忠君”思想决裂，能够喊出这样革命口号吗？明代镇压农民的刽子手王阳明曾有一句反动的名言：“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也从反面说明了农民是具有强烈的革命思想的。至于《水浒》中描写阮小五说：“忠心报答赵官家”的情节，那是作者站在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强加于他的，决不能作为农民阶级不能摆脱“忠君”思想的根据，如果我们不作阶级分析，被封建文人牵着鼻子走，那岂不是“昏庸得可以”吗？

宋江是混入农民起义的地主阶级代表。宋江的“忠君”思想正是他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梁山起义军最后受招安，是由于被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搞修正主义，推行“替天行道”的投降主义路线所造成的。怎么能说是农民没有摆脱“忠君”思想的必然结局呢？事实上，以李逵、三阮等为代表的革命派，对宋江的投降活动进行多次针锋相对的斗争。戏弄招降的“钦差”，撕毁诏书，痛打陈太尉，射死开诏使臣。当宋江得意忘形地要去东京受降的时候，坚持斗争的革命派当下就有三、五千人与他决裂了，这说明革命农民对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坚决抵制的。怎么能说宋江的投降路线在革命的农民中找到了“忠君”的思想基础呢？从农民这个革命的阶级身上寻找宋江投降的思想根源，岂不是要革命的农民对宋江的反革命活动担当罪责吗？抹煞农民革命思想和地主阶级“忠君”思想的原则区别，抹煞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这是阶级调和论在思想领域的表现；不从农民的阶级地位去考察农民是否有自己的革命思想，不用农民革命的实践来检验农民是否摆脱了忠君思想，这是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初期毛主席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时严肃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宋江和武训是一丘之貉，歌颂叛徒宋江和歌颂奴才武训是同样性质的错误。我们应当汲取这个严重教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学会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分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革命派，什么是投降派，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什么是历史唯心主义，自觉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